

奮鬥叢書第二十六種

關於「野百合花」及其他

——延安新文字獄真象——

統一出版社編印

關於「野百合花」及其他目錄

序

一、一片苦悶的呼聲

(一)從蕭軍說起

(二)丁玲的哀鳴

(三)「野百合花」與「硬骨頭」

(四)政治家藝術家與逃避現實

二、一個新型文字獄

(一)所謂思想鬥爭大會

(二)如此罪狀

(三)對王實味的位置

關於「野百合花」及其他 目錄

關於「野百合花」及其他 目錄

三、一種客觀的分析

- (一)野百合花等文產生的前因後果
- (二)新文字獄與三風運動
- (三)自由、平等、民主與特殊式樣的人

序

中共今年強調整頓三風運動，這運動由毛澤東領頭發起，由毛派份子主持之中宣部策劃響應，說整頓三風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上的革命。毛澤東且一再的發表反對黨八股，反對本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文章，上唱下合，滿以為這一號召能把以前所暴露的弱點全部遮蓋住，使青年羣和下級幹部對中共中央發生一種新的好印象，然而戲法變久了，觀衆也懂得如何做戲法，青年羣和中共的下級幹部與文化人等，不但不受這新戲法蒙蔽，反而利用了這一次所謂整風運動，暴露出中共內部的許多無可救藥的弱點，使中共的愚民政策大受損傷，因此使實際掌握中共大權的毛派人物大起恐慌，決定強力制止這種「傾向」的發展，認為揭穿了「邊區」的黑暗是與黨（中共）無利的，認為反對「騎馬的首長」同情「苦悶的青年」是反黨的活動，認為「只看見黑暗」「不夢想光明」就是小資產階級份子的悲哀，認為批評黨的策略，誠實的自我批判就是「托派」的陰謀，在這種完全主觀主義的不合邏輯的論斷下，造成了延安的「新文字獄」。以王實味這人及他寫的「野百合花」等文作為具體應以打擊的對象，以舉行座談會，思想鬥爭大會公開發表各種攻擊文章為手段，企圖收到殺雞嚇猴的效果，而肅清那種所謂「反黨」傾向的發展。但這一切只能在表面上使人屈服於一時，豈能根本阻止中共內部腐化瓦解的危機？！

關於「野百合花」及其他 序

二

茲就此一事件作一詳細報道，俾一般留心中共問題的人士，藉以明瞭延安的許祕內幕。

關於「野百合花」及其他

一、一片苦悶的呼聲

中共慣會向青年宣傳：牠歌讚延安是革命的聖地，牠誇耀陝北是革命的搖籃，前進的，民主的。牠自稱陝北是抗日根據地，是民主政權，是無產階級成長的搖籃。然而歷史最能表明事實真象，這一切名不虛傳的宣傳，不能長久地遮住青年們的眼睛，在陝北，貪污，腐化，首長路線，派系交關，「歌頌玉堂春，舞迴金蓮步」，……等一切紛然雜陳的情形之下，使爲了「抗日號召」跑向陝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許多老共產黨員感到前途沒落的悲愁。青年的覺醒是任何高級手段不能鎮服的，因此延安在黑暗中響遍了苦悶的呼聲。日復一日，這呼聲從壁報上表現到刊物上，從刊物上表現到中共的機關報解放日報上。發言人的這一片苦悶的呼聲從廣大的青年羣到無數的黨員，從黨員到幹部，從幹部到文化運動領導者，一直騷動到中共的中央研究院。同時這一片苦悶的呼聲，由秘密的轉向公開的，由失望的轉向憤恨的，甚至將由號召的轉向實際鬥爭的。今年春天，在延安這呼聲達到了頂點。

(一) 從野軍說起

關於「野百合花」及其他

由魯迅一手提拔起來的「東北作家」趙軍，把老情八道紅擺在香港餓死了，自己抱着「八月的鄉村」風塵僕僕的跑到陝北，却大受土共文化人的排斥，四月八日解放日報刊登着他「論同志之愛與耐」的文章，在第一煞「愛」中，他結尾說：

「年來，和一些革命的同志接觸得更多一些，我却感到這「同志之愛」的酒也越來越稀薄了！雖然我明白這原因，但這却阻止不了我心情上的悲憤。」

爲什麼如此呢；在前文中他說：

「因爲我不願看，也不願讓讀者們看，同志的子彈打進同志的胸膛！」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延安共黨是如何進行同類的屠殺，其派系鬥爭是如何尖銳化，而「愛」的消失是如何使人們悲憤。

在第二篇「耐」中，他說：

「近來常接到一些不相識的同志們的信，信裏面大致是述說自己的痛苦和牢騷。不滿環境，不滿意人，不滿意工作……我對這些向我伸訴的人，我是寄以真誠的同情和尊重的。」

既然是真誠的同情，可算得是「同志」了，在後面他跟着提出一個號召：

「如果不懷抱着登淨土的希望，入地獄的精神，這一生也要不安和痛苦下去的。一個革命者的任務，就是要隨時隨地和醜惡與不義來鬥爭，爲後者開路。」

他希望這些不滿意瑣瑣？不滿意人，不滿意工作的同志們，「隨時隨地」與醜惡與不
義來鬥爭，從這裏也就表現了延安青年對現實不滿和反抗的呼聲。這呼聲只是廣大的苦悶
的呼聲的一種態式。

(二) 丁玲的哀鳴

三月九日，丁玲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三八節有感」，這篇文章告訴我們陝北婦女
們苦悶生活的全貌。丁玲是共產黨員，是中共婦運和文運的權威，她的話當然是可靠的。
首先她幽默地述說三八節的不被中共重視和虛應與故：

「延安雖說這兩年不如前兩年熱鬧，但似乎總有幾個人在那裏忙著。而且一定有大會
，有演說的，有通電，有文章發表。」其次說到女人在延安可憐的處境：

「延安女同志不能免除那種幸運：不管在什麼場合都能作爲有興趣的問題被談起。
而且各種各樣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應得的讚揚，這些責難似乎都是嚴重而確當的」。
「女同志的結婚永遠使人注意，而不會使人滿意的。她們本不能同一個男同志比較最
好，更不能同幾個都接近。她們被畫家們諷刺：「一個科長也嫁了麼？」詩人們也說：「
延安只有騎馬的首長，沒有藝術家們的首長，藝術家在延安是找不着漂亮的情人的」。然而
她們也在某種場合聆聽着這樣的訓詞「他嗎的！瞧不起我們老幹部，說是土包子，要不是
我們土包子，你怎麼來延安吃小米！」但女人總是要結婚的。（不結婚更有罪惡，她將更多

的說作爲製造謠言的對象，永遠被污蔑。）不是騎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藝術家就是總務科長」。

結了婚的女人十分之八九是不幸，也偶有一兩個特殊階級的女人是幸福的，最好還是看了玲的原文：

「她們都待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運：有的被細平毛線和花絨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懷裏，有的被沒有洗淨的布片包着，扔在床頭啼哭，而媽媽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貼（每月二十五元，價值豬肉二斤半）要是沒有這筆津貼，也許他們根本就嘗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應該嫌誰呢？事實是這樣，被逼着帶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開的諷諷：「回到家裏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星期可以有一次最衛生的交際舞，雖說在背地裏也會有難比的諷語悄聲的傳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裏，那裏就會熱鬧，不管騎馬的，穿草鞋的，總務科長，藝術家們的眼睛都會望着她。這同一切的理論都無關，同一切主義思想也無關，同一切開會演說也無關，然而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說，而且在做着的事實。」

這段文字說透了陝北婦女地位的不平等和遭遇的歧異，這段文字揭露了陝北紙幣金迷，阿諛和憤恨的交流。然而女人在陝北更苦的還在結婚以後的事。第一養了小孩子，她們不願被認爲「落後」的娜拉，如是：「她們四方奔走。厚顏的要求行兒所收留她們的孩子

，要求割子宮，寧肯受一切處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險吃墮胎的藥，而她們聽着這樣的回答：「帶孩子不是工作嗎？你們只貪圖舒服，好高騖遠，你們到底做了一些什麼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這樣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負責，誰叫你們結婚呢？」於是她們不能免除落後的命運。……這些落後份子，也實在不是一個可愛的女人，她們的皮膚在開始有摺皺，頭髮在稀少，生活的疲憊奪去她們最後一點嬌愛。她們處於這樣的悲運，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舊的社會裏，她們或許會被稱為可憐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該！」在陝北，女人結婚第二件可悲的事是隨着小孩和紅顏羶時輕易的被男人們遺棄：「面離婚的口實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後，……不是聽說法律上還在爭論着離婚只須一方提出，或者必須雙方同意的問題麼？離婚大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討女人受咀咒」。而且丁玲希望男子們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們少發空議論，多談實際的問題，並勸誠女人要讓自己生病，不過無節制的生活，要愉快，要用腦，不要被一切甜密所蒙蔽，被小利所誘，而浪費熱情，浪費生命，免除煩腦，並勸女人要有吃苦的決心，堅持到底。

這篇大作最後還有附記，說是還有很多意見未能說出，又說：不過又有這樣的感覺：覺得有些話假如是一個首長在大會中說來，或許有人認為痛快，然而却寫在一個女人的筆下，是很可以取消的」。

讀完了玲這一驚可憐的哀鳴，我們可以知道女人們在陝北是處於怎樣沉痛悽慘的境況了。她們失掉了做人的權利，她們被剝奪了做人的幸福與快樂，不論結婚以前，結婚以後，都是騎馬的首長，藝術家，總務科長等謾罵，玩弄，欺侮的對象，而一到臉黃腰粗之時，則結果就被遺棄了。偶而也有「有保姆帶着用細毛織品包着的小孩」的母親，每星期捧着最衛生的交際舞，但那只是風毛麟角，而也只是大首長們臨時的眷愛，最後一點嬌愛失去的時候，被遺棄的命運是相同的。

中共在後方極力宣傳陝北的婦女是平等的，自由的，幸福的，這就是陝北婦女平等自由幸惡的真象。

(三) 野百合花與硬骨頭

三月十三日，以譚譯馬列主義等著作在延安著名的文化人王實味，牢騷滿腹的發表了野百合花。在前記裏面，他說明在那「歌嘯玉室春，舞迴金蓮步」的昇平氣象中，不願說話但是又不禁欲言，於是把「指出下面一段文字作為說話的盾牌與號召：

「一九三八年冬天，我們黨（共黨）曾大規模檢查工作，當時黨中央號召同志們要『議論紛紛』『意見不管正確不正確都儘管提』，我希望這樣的大檢查再來一次，聽聽一般下層青年的『牢騷』，這對於我們的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處。」

首先他提出「我們生活裏缺少什麼？」下面介紹他寫的幾段原文：

「延安青年近來生活得有些不起勁，而且似乎肚子裏裝得有不舒服。」

爲什麼呢？我們生活裏缺少什麼呢？有人會回答說：我們營養不良，我們缺少維他命，所以……；另有人會回答：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許多青年找不着愛人，所以……；還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生活太枯燥，太單調，缺少娛樂，所以……；這些回答都不是沒有道理的。要吃得有一點，要有異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這些都是天經地義。」

但是延安的青年們除了以上幾種苦悶外，還有更大的痛苦，然而他們不敢公開訴說，但在一切私的場合和知交的談話中，不滿意延安的話語皆被青年人「低聲而興奮地談着」：（以下是引證原文兩個女青年的對話。）

「……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能壞也能，病也能死也能，差不多漠不關心！」

「哼！到處的老鴉一般黑，我們的××同志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好像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平常見人笑得笑嘻嘻，其實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長架子來訓人。」

「大頭子是這樣，小頭子也是這樣，我們的科長，×××，對上是畢恭畢敬的，對我們却是神氣活現，好幾次同志病了，他連看都不伸頭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鷹抓了他的一隻小雞，你看他多麼關心這件大事呀！以後每次看見老鷹飛來，他却嘎嘎的叫，扔土塊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傢伙！」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來叫人難過。其實，害病，倒並不希望那類人來看你。他只能給你添難受。他底聲音，表情，態度，都不使你感覺他對你有什麼關懷、愛護。」

「我兩年來換了三四個工作機關，那些首長以及科長主任之類，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

「是呀，一點也不錯！他對別人沒有一點愛，別人自然也一點不愛他。要是做羣衆工作，非垮台不可。……」

延安騎馬的首長和統制者早已聽見這一片苦悶的呼聲，他們的代言人常是叫嚷青年人們不夠「少年老成」，譏諷青年人們缺少無產階級的成分。王實味對這種誣蔑青年人的論調提出了反抗：

「青年之可貴，在於他們純潔，敏感，熱情，勇敢，他們充滿着生命的新銳的力。別

人沒有感覺的黑暗，他們先感覺，別人沒有看見的黑暗，他們先看到；別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他們大膽的說。因此，他們意見多一些，但不見得就是牢騷，他們的話或許說得不够四平八穩，但也不見得就是叫嚷。我們應該從這些牢騷叫嚷和不安的現象中，去探求那產生這些現象的本質，合理地消除這些現象的根源。說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導青年，不發牢騷，說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一些微細的事」，「算不得什麼」，這些絲毫不能解決問題。……青年到延安來追求「美麗和溫暖」他們却看到了延安的「醜惡和冷淡」，而忍不住要發「牢騷」……

「延安青年已經夠「老成」了！前文所引兩位女同志的牢騷，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聲音發出的！」

在野百合花第三節「必然性」與「天塌不下來」與「小事情」中，王實味說：

半截馬克斯主義者認為黑暗的存在有必然性，儘管睡覺，天也塌不下來，於是乃在那兒間接助長黑暗，甚至直接製造黑暗！你批評他，他就說這是小事情，有的「大師」們甚至說：「媽的個×！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現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在延安大概不會出什麼叛黨叛國的大事情的，但每個人做人行舉的小事情，却有的在那兒幫助黑暗，而「大人物」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們心裏或喚起溫暖，或是引起寂寞。」

第四節中王實味提出「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的標題，首先他說有某機關的同志用這

爲題寫文章在牆報上，結果「首長」將他打擊到瘋狂狀態，但王實味是不會瘋狂的，他有「幹部服」穿，有「小廚房」吃，發表文章完全是站在「熱愛」的立場。他說：

「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祇得到兩餐稀粥，（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要起模範作用回答吃得飽！）另一方面有些頗爲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僅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這一章雜文引起大多數延安苦悶青年的共鳴，甚至使奉命批評野百合花的筆者也寫出了延安等級制度的馬脚！

「我以爲今天延安在生活上，在供給制度上，在許多工作上，確是存在有嚴重的缺點，甚至有個別的同志，竊洞前臘肉掛得老長，蹣起腿來當馮公的」。又說：

「延安今天有些單位的負責同志，不關心下層幹部，有些人搭架子訓人，或甚至實行家長制，我想這情形該是有的。」（原文見解放日報四月七日）

這位笨伯的話更證實了王實味所說的延安在上者驕奢淫佚，在下者苦不堪言的實況。也證實了延安的等級制度已到了難說話便有陷於瘋狂（）的危險，已到了下對上，上對下皆視爲「異類」的地步。

同時王實味在中共的中央研究院的壁報上發表了「硬骨頭與軟骨病」的雜文，他說：
「在這一鬥爭中，我們必須首先檢查自己的骨頭，向自己發問：同志，你們的骨頭有毛病沒有？你是不是對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話不敢說？要了解，軟骨病本身就是一種邪氣，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

王實味是以硬骨頭自命的，如是在整頓三風的口號下，強調自我批判是必需的，王實味在中央研究院公開討論時提出了：「黨（共黨）的領導骨幹變質了，蜕化了！」「黨內黑暗勢力佔着支配地位！」「黨成功了功利主義的黨！」「黨的領導幹部公然剝削壓迫黨內的羣衆！」等口號和具體事實，希望糾正那些錯誤的作風。這些話深使他的同志們發生同感，尤其是得到大多數青年人的擁護。但並不能打動延安首長的心。等級制度，官僚作風，壓迫婦女，漠視青年，歌嘯玉堂春，舞迴金蓮步，依然使延安表面上是歌舞昇平，內部裏衝突激蕩。

（四）政治家，藝術家與逃避現實

「野百合花」和「三八節有感」發表以後，青年，婦女，以及知識份子的普遍擁護使王實味又鼓着勇氣寫出政治家與藝術家，他把牠發表在延安銷路最好的刊物「穀雨」一零四期上，全文十三段，以雜文形式寫出他的感想，理論與希望。他說：

「中國革命是特殊困苦的。社會制度改造一方面之艱苦，大家都很了解，而人底靈魂

改造一方面尤其艱苦，懂得這道理的人却不多。……舊中國是一個包藏裏頭的，充滿着骯髒和黑暗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生長着的中國人，必然要沾染上它的，連我們自己，也不能例外。」

他說：「除非真正偉大的政治家，總不免多少爲自己底名譽，地位，利益也使用他們，使革命受到損害，在這裏，我們要求貓的利爪只用以捕耗子。不用於捉雞雞，這裏劃分着政治家與政客的分野線。」

這兩句話前者說明了延安的人物沾染了骯髒和黑暗，後者說明了延安統治者是一批爲自己的地位，名譽，利益而害人的政客。

怎麼辦呢？王實味提出了補救這病象的方法，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藝術家的身上，懇求藝術家「改造人底靈魂。」其憤激熱烈的情緒充滿了全文。他說：

「延安的政治家們說到了藝術家時使嘴角浮漾着冷諷的微笑。……但是藝術家主要是革命精神力量激發者。……往往更熱情，更徹底，善於揭破骯髒和黑暗，指示純潔和光明，從精神上充實革命的戰鬥力。……他從小處落筆，務求盡可能消除黑暗，縱使歷史車輪以最大的速度前進。」

他說：「我們的革命事業有兩方面：改造社會和改造人——人的靈魂。政治家……的任務偏重改造社會制度。藝術家是靈魂的工程師，他的任務偏重改造人的靈魂（心，精神

，思想，意識——在這裏是一件東西。」

因此他號召：「藝術家……大膽地適當地揭破一切骯髒和黑暗！清洗他們！這與歌頌光明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敬向藝術家同志們發出一個敏弱的呼聲：更好地擔負起改造靈魂的偉大任務罷，首先針對着我們自己和我們的陣營進行工作。」

這是積極的戰鬥的反對的呼聲，他不僅是王實味個人的呼聲，而且是代表那一羣不滿於延安現狀的知識份子，藝術家，和青年們的呼聲。

與之相反的還有一派人，他們不滿延安現狀，但是沒有勇氣反抗，（他們「明哲保身」，「迴避那空言抗議是自尋燬滅。」）他們主張遠離現實，希望脫離那醜惡的現實的苦海。但是不能，這是多麼悲憤與痛苦的事！這裏僅舉一例，我們即可以見其全貌。

何其芳是延安有名的詩人，四月三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三首詩，全詩充滿了厭世憤俗的結語：

什麼東西能夠永存？

人在日光之下的一切勞碌到底有什麼益處，

人既死那麼快的從搖籃到墳墓。

……

——什麼東西能夠永存——

剛，時間的灰塵遮蓋了我的心靈，

關於「野百合花」及其他

我太久太久沒有想起過他們！

我最早的朋友早已睡在墳墓裏了。

我最早的愛人早已作了母親。

我也再不是一個少年人！

但自然並不因我停止了它的前進，

世界上仍然到處有着青春，

到處有着開放的心靈。

年青的同志們：我們一齊走到野外去吧，

在那柔和的藍色的天空之下！

我想對你們談說種種純潔的事情。

——我想談說種種純潔的事情——

因為不是容易被欺騙鼓動的少年人了，而且知道自然不會因他而停止運行，認為反抗

掙扎是沒有用的，但是又討厭那不純潔的環境，於是只有叫喚青年「到野外去」，聽詩人

「談說純潔的事情」。叫青年人逃避，「世界上仍然到處有着青春」。

多少次呵！我離開了我日常的生活，

那狹小的生活，那樣帶着塵土的生活，

那發着喧囂的聲音的忙碌的生活，
走到遼遠的沒有人跡的地方，
把我自己投在草地上，
我像回到了我的最寬大，最會撫慰人的母親的懷抱裏，
她不說一句話，只是讓我在她的懷抱裏痛快地哭一場，
或者靜靜地睡一覺，
然後溫柔地沐浴着我，
用河水的聲聲，用天空，用白雲，
一直到完全洗淨了我心裏的一切繁瑣，重壓和苦悶。
我像一個新生出來的人，
或者像一個離開了人世的人，
只是吃着野果子，吸着露水過我的日子，
完全忘記了世界是一個地獄，
而所有的人都是無罪的囚徒。

——多少次呵我離開了我日常的生活——
延安的生活是如何使人感到「重壓和苦悶」！它逼迫人走向荒野痛哭，它使人識認

世界是一個地獄，所有的人都是無罪的囚徒！——這充分地表現了延安青年人們莫大的苦悶。

以上各節所述僅係就手邊的材料舉出的例子，從這裏面已可以看出陝北的全貌，中共的厚顏宣傳與延安的實況恰成爲一幅最醜惡的對照。

二、一個新型文字獄

以上許多類似文章不斷的發表，引起了延安專制者的震懾，新的文字獄於五月二日的延安文藝界座談會即現了端倪。這個會是由毛澤東和中共宣傳部長何凱豐出面主持的。

這次會議中也運用了「一打一拉」的策略，一面對文藝作家表示尊崇與愛護，一面批評文藝作家強調延安的黑暗是不對的。會中並着重地宣讀了列寧著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中共宣傳部把全文刊在五月十四日的解放日報，用列寧對文學的主張作爲中共對文學的主張：

「這個黨（共黨）的文學底原則在那裏呢？不僅在，對於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文學事業不能夠成爲榨取個人或集團的工具，它一般地不能成爲脫離總的無產階級事業的個人事業，打倒無黨派的作家！打倒超人的作家！文學事業應該成爲總的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份

根據這個文件的指示，中共宣傳部佈置了與王實味等揭露延安黑暗的文學傾向作無情的鬥爭。許多批評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與藝術家」的文章在解放日報陸續刊登了。

但這沒有什麼效力，許多幹部認為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等文章是對的！是自我批判，是同志，動機是好的。而黨軍在「對於當前文藝諸問題我見」中，一面承認「作家是人類靈魂的技師」，一面提出「批評的時候，立場雖要堅定，但儘可能要公正！所謂名正言順，堂堂作戰！多下說服工夫，少用打擊力量！」（見解放日報五月十四日）這一切使毛澤東同凱豐等深感憤怒與憂慮，認為這種趨向必須加以克服。計劃復計劃，研究復研究，一而所謂「思想鬥爭大會」於五月二十七日起在延安舉行了。

（一）所謂思想鬥爭大會

思想鬥爭大會是中共運用以打擊「反對者」教育羣衆的一種手段，每一次思想鬥爭大會的舉行，就類是一次軍法會審，被審訊的被逼招供後照例執行刑罰。對中共最忠實最熱忱的王實味竟戴上了「反對者」的帽子而做了這一次思想鬥爭大會的囚徒。

這次大會于五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半起在中共中央研究院舉行，一連舉行十六日，自中共宣傳部長何凱豐，偽陝甘寧邊區政府祕書長周文，偽教育廳廳長柳湜應中央研究院黨委羅邁，副院長范文瀾，與陳伯達張心如艾思奇金燦然，以及中共中央研究院學員，和毛

系的文化人等，都參加，擠擠一堂，頗極一時之盛，發言者計自何凱丰以下的一般重要人物都會發言，滔滔不絕，造成對王實味一面倒一窩蜂的攻勢。王實味會說反黨與申述，但這是無用的。有計劃有組織的發言人最先替他安上了一頂「托派」的帽子，「托派」在延安是殺無赦的，一切出席而同情王實味的人物都噤若寒蟬，因為「誰同情王實味誰為之辯護，誰也就是托派了。」丁玲等因此也人人自危，最後一天丁玲也不得不被迫在大會上發表她「打落水狗」的意見，以作保全生命的供詞：

「王實味反黨的思想 and 反黨的行為，已經是政治問題，文藝界不是贊成便是反對。（已經宣佈王為托派了，當然只有反對——編者）打擊王實味這人，並且反對一切對王實味還可能有的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人道主義，失去原則的自以為是的正義感。（極力表示自己不是王的同黨——編者）」

但精彩的發言却在後半段，在供詞中一面認罪不赦，一面也流露了不平之詞：

「王實味的兩篇文章考驗了延安的文藝家，這兩篇文章是經過了編輯的眼睛而在文藝的副刊和雜誌上登出來的，刊登以後沒有一個文藝家向編者或讀者提出注意，直到今天也還沒有一篇批評是出之文藝家之手的。（這就說明了文藝家對王實味的兩篇文章咸抱有同情——編者）誰登載的，文藝家，誰發現這文章有毛病的，誰提出注意的，却又不是文藝家，（言外之意，即是延安的言論統制者提出注意的——編者）」

「我讀了野百合花原稿之後，會感到有些過份。態度欠妥，而隱了幾天；却終因缺稿寄到報館去發表了。……我只站在一個普通的編者的立場（非黨員或黨報）去決定稿件的取捨，而對於自由爭論的理辯不夠，和政治的幼稚，現應受一切嚴重的批評！」

接着她對自己所寫的「三八節有感」也加以申辯，並自請處分，但是牠說：

「關於這一篇文章，到昨天我還接到署名同感者的來信，問那篇文章的缺點究竟在那裏，表示對某些批評認為不適當。」

「儘管我灌注了血淚在那篇文章裏，安置了我多年的痛苦和寄與了熱切的希望。但那文章本身仍舊表示了我只站在一部份人身上說話，而沒有站在全黨的立場說話。」

這文章灌注了血淚寫成，又是丁玲多年的痛苦，而這痛苦是婦女們共有的。但是牠說錯了，犯的錯誤或是沒有站在「全黨的立場」，全黨的立場就要犧牲婦女界的幸福麼？這一點顯然是表示她承認錯誤是不得已，是違反她自己的「人性」。最後她並着重的叫喚：

「我再三的告訴你們，那不是好文章！（顯然地有許多婦女、青年和知識份子深信那是一篇好文章——編者）讀文件去吧！」

這幾句話中蘊藏著多少哀怨及莫可奈何的心情？

鬥爭大會舉行至此，主持者可謂已經完全勝利了，用托派的帽子罩住王實味，而發表野百合花的中共黨報的編者丁玲也公開一面自己承認錯誤，一面大打落水狗。但是迫不得

已呵！

但王實味不愧爲「硬骨頭」，既然被誣爲「托派」，惟有待死而已。舉行思想鬥爭大會的第七日（六月二日），王實味於否認自己是托派，痛抨延安現狀後，並公開提出退出共產黨的要求，他說他「個人與黨的功利主義之間的矛盾是幾乎無法解決的」！他要去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他「不怕任何危險與威脅」。

六月四日，王實味對中共思想鬥爭大會提出了反攻，他不僅不承認自己是「托派」，而且指出共產黨的作法就是托派的作法，他說：「我看到八一宣言，覺得這和托派國民會議的主張差不多！」「我是看到了魯迅答托派書，我才站到統一戰線的立場。」「我批判陳伯達，他立刻罵我是第二國際機會主義，他也可能再罵我是第四國際……陳伯達的作法就是宗派主義！」大會嚴厲的制止了他的發言，這種發言是與鬥爭大會主持人不利的。以後又一連舉行了討論大會七日，王實味被禁止發言，帶着待死的心情傾聽那長篇宗派主義者的黨八股的批判。

所謂思想鬥爭，就是嚴格的思想統制，這個大會就是一個新的文字獄的會審。王實味明白中共這種作法，一切出席大會的人也明白這種作法。惟有心情是分作兩個壁壘：一面是宗派主義者，獲勝的驕傲情緒，一面是免死狐悲莫可奈何的感想。

（二）如此罪狀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下面是毛系文人及宣傳者加於王實味的罪狀：

「實味的野百合花，是號召青年，號召新幹部，號召炊事同志，向老幹部，向領導機關進攻。就是他們所說的『針對着我們自己和我們底陣營進行工作』。：：所謂的『不願再算階級仇恨的舊賬』，所謂的『拖曳着舊中國代表者』，所謂的『在拖曳過程中，舊中國的骯髒污穢也就沾染了我們自己，散佈細菌，傳染疾病。』把這統一戰線塗抹得如何的可悲可慘，在字裏行間，閃閃爍爍地跳動着挑撥的黴菌！」

「簡直是信口開河，胡說八道，含血噴人。」

「簡直是一個靈魂扒手！」

「簡直是在我們的頭上屙屎，在我們後園裏挖祖墳，在散佈細菌，傳染疾病，在直接製造黑暗。」

以上是偽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周文對王實味宣佈的罪狀，（文見解放日報六月十六日）字裏行間只看得出一片漫罵聲。

其次是中共的所謂社會哲學家陳伯達對王實味的裁誣：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王實味的思想是包含一個反民衆的，反民族的，反革命的，反馬克斯主義的，替統治階級服務的，替日本帝國主義和國際法西斯服務的托洛茨基主義。」

「他是企圖利用青年的弱點，引誘青年走上黑暗的道路。他是不是爲黨呢？我們可以說，他破壞黨，是從小組支部一直到全黨的。」

「他愛誰呢？他愛托派，他愛托洛茨基主義，他愛各種反革命的力量。他恨誰呢？他恨共產黨，恨馬克斯列寧主義，恨一切革命的力量。」

「王實味說他是硬骨頭。偉大的，他偉大得象條螞蟻，說不上有硬骨頭，更說不上有硬骨頭。」（文見解放日報十五日）

在這一總的謾罵，栽誣，打壓的攻勢下，被中共支配出版的報章，刊物，紙報一律長篇大論的對王實味這「落水狗」大加攻擊，然而除誣以「托派，反馬克斯列寧主義，反黨的活動外」，率皆言之無物，成爲全延安青年心照不宣的「黨八股」。沒有人相信牠，沒有人注意牠，也沒有介紹的價值。

最後一日，羅邁的發言可以算是這個鬥爭大會的審判書：他說：

1. 兩個星期的論戰，一方面算清了過去，一方面澈底揭發了王實味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黨行爲，使大家在思想的改造上前進了一步。

2. 支配王實味思想的是托洛茨基份子的思想，是反動地主資產階級的思想，是傾落的小資產階級的極端破壞性，瘋狂性和絕望心理。他不只是有政治目的，而且有組織企圖。

3. 王實味的反黨思想，反黨行爲及其散佈的影響，必須澈底肅清。

4. 注意研究文件，改造作風。

最後發言的是范文瀾，他的話是一個簡短的結論：

「王實味是個什麼人？他是個托洛茨基份子。」

「我們用盡苦心想把他從茅坑中拉出來，他却想把我們拉到茅坑裏去，這真是豈有此理！」

「今後大家應該注意：下決心徹底反對自由主義，嚴守紀律，嚴禁小廣播，提高政治的警覺性，切實反省自己。」

以上所引的罪狀不僅證明中共對「反對者」只有漫罵栽謬與施行高壓手段，而且由文章的反面我們可以看出：

1. 反對延安的「小廣播」是風行於延安的。
2. 延安是決無思想自由，決無言論自由的。真誠的批評者就是反對者！
3. 延安的主觀主義者保存了宗派主義，延安的「言必稱聯聯的大師們」保存了黨八股。

（三）對王實味的處置

在黨籍方面：王實味是一九二六年入黨的老共產黨員，為共黨翻譯了兩百萬字左右的馬列主義的文章，歷史不可謂不長，工作不可謂沒有貢獻，但在這次有計劃的打擊下，王

實味在思想鬥爭大會中憤而提出退黨的要求却不被允許，而最後鬥爭大會的主持人方面又決議交黨委處置，並要求黨開除他的黨籍，開除黨籍是沒有問題的，王實味既然被帶上托派的帽子，開除黨籍是最低的第一步的處分。

在公開地位方面：王實味是延安有名的文化工作者，爲了要公開擴大對於王實味打疊的影響，所謂延安文藝界於六月十八日起奉命舉行座談會，丁玲被迫擔任主席，通過對於王實味事件的決議三項：

1. 我們一致認爲，王實味的「根本」思想是托派的思想，他根據這種思想而進行的各種活動，是托派的活動，這是反對無產階級，危害共產黨和革命事業的，是一切革命者和革命同情者所應堅決反對的。（豈是由衷之言——編者按）

2. 我們一致認爲，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藝術家」，正是他的這種錯誤思想的宣傳，而當時「解放日報」文化欄和「穀雨」未能加以揭發和批評，反而予以刊載，是不適當的。

3. 我們一致認爲，中央研究院和解放日報最近所進行的對於王實味的清算和鬥爭，是正確的，必要的，對整個文藝界和對我們自己都有很大的教育意義，所以我們共同一致擁護這個鬥爭。

解放日報繪聲繪色的強調這次文化界座談會舉行的經過，且把文化界抗敵協會延安分

會開除王實味會藉的決議用大字標題刊登。「打擊王實味」既成了中共宣傳家的戰略方針，則這一切公開的打擊俱為「題中應有之義」。

至若王實味的生死問題是很簡單的，按照中共的習慣法，一個同志既被指定為托派，則該某即為托匪，托匪即殺無赦，王實味既被誣為有托派的思想，又有托派的活動，而且是「不，只是有政治目的，而且有組織企圖。」證以近兩月來未聞有王實味的消息，想已含冤九泉了！

嗚呼哀哉！

三、一種客觀的分析

(一)「野百合花」等文產生的前因後果

中共內部門爭自張國燾派被肅清後，主要的鬥爭派別為以毛澤東為首的幹部派與以陳紹禹為首的留俄派的鬥爭。而自新四軍叛變以後，又發生了下級幹部與首長路線官僚統治者的鬥爭。為了打擊留俄派，毛派提倡「馬列主義中國化」，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反對黨八股；為了鎮壓下級幹部的動搖自新脫黨，毛派實行所謂精幹政策，清除動搖份子，加強學習與統制。在鬥爭的發展中，毛派大權在握，着着勝利，包辦了上中下各級「騎馬的首長」與「羣產錢物的總務科長」，有癩骨病的延安藝術家們為了分嘗一點餘涎也

關於「野百合花」及其他

不得不附上毛派的尾巴，內部門爭的勝利衡量了毛派各級幹部的頭腦，如是延安「歌嘯玉堂春，舞迴金蓮步」，「只看得見一羣駑駘淫佚毫無心肝的陳叔寶們享受民脂民膏！」

這使得一部份非毛派的人物心灰意冷，同時也使另一部份非毛派的人物憤慨填膺，前者走入消極沉默——沉默是最大的悲哀。後者步入呼籲、組織、反抗——反抗是對統治者的回擊！

「野百合花」等文是反抗的呼聲，牠得到一切反對毛派的份子的支持，牠更得到一切純潔青年的擁護。「詩三章」等是苦悶的呻吟，牠得到一切消極份子的同情，更喚醒了多數青年的覺悟。這兩種傾向直接間接對於毛派都是巨大的打擊。

毛派爲了阻止這兩種傾向的發展，運用了全部的力量對王實味痛加打擊。座談會，思想鬥爭大會，兼旬舉行，攻訐「野百合花」「政治家與藝術家」的文章累片繼續刊載，這就證明了不僅僅是對王實味個人的打擊，而是要壓服以上兩種傾向。丁玲與王實味二人的文章本有異曲同工之妙，丁玲之所以未遭到嚴重的打擊，是因丁玲在全國文壇上具有相當的名望，如一同嚴懲，則恐更引起全黨和文藝界與青年界之反感與不安，因此除過了玲以自我批判并出面打擊王實味之方式，以自贖外，而王實味一人便成了不幸的犧牲者，便「作了殺雞給猴看」的雞——而又一個可的犧牲品！

發展到目前爲止，在表面上看，這次所謂思想鬥爭是毛派大獲全勝的。如前所云，思

想鬥爭大會恰如會審的法堂，解放日報等於法院判決書的公佈欄，而王實味不過是一名被壓迫者的代表，被審判的囚徒。這種勝利的形勢是「必然的」，而也必然的「無所得」。

既然是一方面有病的同志喝不到一碗繭湯，而另一方面大小首長中灶之外，又有小廚房；一方面前線有同志在敵人的面前被濺淚，而另一方面又有人在延安大跳最衛生的交際舞，等等，則王實味所代表的這種傾向，是非毛派殺一兩個反抗的虱子所能阻止的。

這次鬥爭只可能有兩種收穫：第一種是使青年人在黑暗中的「低沉的聲音」變成耳語，使反對延安的「小廣播」更多，技術更精明。第二種是使「同志們」又多了一次認識首長們殘酷地處置「同志們」的手段的黑劣！又多看一次：「同志的子彈打進同志的胸膛」！這兩種收穫是毛派的人不願意享受的，但這事實是事實，你壓力愈大，他反抗力愈強。

(二) 新文字獻與三風運動

中共的所謂整頓三風運動中有一條是反對「宗派主義」的整頓黨風，中共對宗派主義的表現會有如下的說明：

「在黨內鬧獨立性，不服從上級，不服從中央，個人與黨對立，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對立，老幹部與新幹部對立。不是互相諒解，互相幫助，而是一個輕視一個，一個欺負一個……這便是宗派主義的表現。」

關於「野百合花」及其他

這次王實味的事件就是一次反宗派主義的鬥爭，結果是宗派主義者們勝利，王實味被「反對宗派主義」這一美麗口號葬送了，他忽視了延安現實醜惡的力量。延安的現實是幹部對立，是互相敵視，是一個輕視一個，一個欺負一個，延安不准反對幹部派實力派，毛派就代表了中共中央，他們強據「上級」，抓盡「首長」地位，不准任何人反對，誰反對「如此中央」誰就是叛黨份子。這種宗派主義的作法自中共成立以來即始終存在，此後亦必然是永存於中共黨內的。中共一面高唱「反對宗派主義」，一面又加緊了宗派主義的作風，這就說明了中共黨的「人格」，和中共份子的「人性」是如何卑劣，及必然潰滅。

由王實味這一事件也可以看出「反對黨八股」只是同樣的空洞的口號。這次在所謂思想鬭爭大會上，毛派發言人開口閉口全是「裝腔作勢，藉黨嚇人」「無的放矢，不着對象」，「語言無味，言論貧乏」，「空話連篇，全文無物」，「不負責任，專門害人」！毛澤東們痛心疾首要改正的黨八股現象，他的嘵嘵却依然是照舊進行。因為離開了黨八股，他們不能說話作事，離開了黨八股，他們也無詞害人。

同樣地，毛派份子一絲一毫沒有丟開「主觀主義」，一切對他們不利的聲音，與活動全被認為是反動派與托派的作法，這些大師們永遠是「言必稱希臘」！一切皆引證蘇聯作例子。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所謂「整頓三風運動」只能作為中共一個新的號召，三風運動不能真的整頓，也整頓不好，這是中共最大的苦悶。也是他必然歿落的成因。

(三)自由平等、民主與特種式樣的人

在中共內部，自由平等民主全是沒有的，這次王實味的事件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證。王實味要爭取「自由」，毛派的人說：產生自由主義的思想，是由於存在着小資產階級思想，是黨內外的鬥爭經驗不夠，是修養不足，是非布爾雪維克化的。說自由主義是產生於「人性論」與「純化論」，說這種理論根據是「十足的反黨反無產階級反革命的思想」，又引證蘇聯為例，說王實味要求有一點自由就是托派的活動。

王實味呼籲要平等，毛派的人說：揭示「等級制度」是王實味號召青年向首長進攻的武器。對於延安確實存在的等級制度不平等的現象却理屈詞窮。

王實味要求民主，毛派的人說：王實味的民主是反對「集中領導」，是自由放任主義；其目的是為了分裂黨，瓦解黨的團結，削弱戰鬥的力量，等等。

以上所述，皆可以看出毛派的人對於要求「自由、平等、民主」等問題的對付辦法皆為強詞奪理，無的放矢，空話連篇，藉黨嚇人。

延安沒有自由平等與民主，延安却有了特殊的人，中共中宣部長在「整頓三風是黨在思想上的革命」文中說：「斯大林同志說的：『我們共產黨人，是特種式樣的人，我們是

由特殊材料製成的」。並厚顏無恥地說整頓三風在行動上却是起了革命的作用。由王實味的事件我們所看出的這個「革命作用」，就是依然黨風不正，學風不良，文風不振。這羣「特殊式樣的人」也依然是實行專制，反對自由；實行等級制度，反對平等；實行一律包辦，反對民主。「糞土堆裏長了幾顆小小的野百合花，不經意的望去，似乎也還有幾分姿色，仔細一研究，原來枝枝葉葉都充滿着要人性命的毒汁」。這一抽象的比喻很可以說明中共具體的形象。

但，流寇落草的局面終不能常存，內部派別交閥，上下形同異類，在上者驕奢淫逸，在下者終日不飽，這一切不過是加速中共的滅亡日期到來，因中共的決無前途已有其必然性，這裏不再論及。只可惜許多純潔青年往往受其欺騙而被利用犧牲而不能自覺，待覺悟時又不能反抗，或反抗即為其殘酷打擊消滅。中共為王實味所構成的這新型文字獄，亟宜作為殷鑒。

統一出版社編印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編印